身兼驻华公使和首席商务监督，他们既是香港的最高首长，又负责主持英国对华交涉和通商事宜，其权力大大超过一般的直辖殖民地总督。早期香港高等法院不仅是港岛最高司法机关，而且是英国在华的司法中心，掌握着行使在华治外法的最高权力；中国各通商口岸较重要的英侨案件，均由驻当地领事进行初审后提交香港高等法院审判定案，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司法主权。军事方面，香港曾经是英国在远东地区最大的海陆军基地，素有“东方直布罗陀”之称。昔日耀武扬威地在中国沿海沿江巡戈的英国炮舰，其主要巢穴就是香港。1847年，港督德庇时因广州入城纠纷，甚至亲自率军舰从香港闯入珠江，用炮火摧毁沿江炮台，强迫耆英接受了他的蛮横要求。两次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期间，香港都是英国在华的主要兵站和后勤基地，在历次侵华战争中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经济方面，香港长期是英国对华鸦片走私的中心，数万箱鸦片每年从香港转销中国各地，使中国人民遭受无法估计的损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香港开始成为远东地区重要的转口港；到1890年，55%的中国进口商品和37%的中国出口商品都经过港埠。与贸易的发展相适应，1865年汇丰银行总行在香港宣告成立；往后几十年中，这家实力雄厚的英国殖民地银行在控制中国金融市场方面起了很突出的作用。鸦片战争以来，英国长期雄居头号侵华国家的地位，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极大；香港作为昔日英国在华的主要据点，它的历史作用当然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清代边疆史地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除了香港史以外，还有很多重要的课题有待深入研究。这个学科历来与现实有密切关系，为了满足现实的需要，我们应该做出更大成绩。

关于加强清代疆域和边界问题研究的意见

吕一燃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它是各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共同缔造的。中国疆域的形成有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不是从来就是这样的。在中国疆域发展史上，清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清代前期，经过几个朝代的经营，到了乾隆年间，完成统一大业，奠定了伟大祖国的疆域。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边境地区遭到了列强的蚕食鲸吞，边界线发生了剧烈而频繁的变动，并遗留下一些历史悬案。就是在边界线已经划定的地段，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争议地区。所以，研究清代的疆域和边界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不仅是本学科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解决边界争端，处理中国和邻国的关系，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有重视疆域和边界研究的传统。鸦片战争前后，一些关心祖国命运的学者，鉴于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开始从事疆域和边界问题的研究，写出了一批颇有学术价值的论著。民国年间，不少学者续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并出版几本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著作，同时还创办了《禹贡》等多种有关边疆研究的刊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疆域和边界问题的研

究一般只限于内部进行，外交边界谈判资料的搜集整理，有关边界问题的专题研究，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大多采用这种形式。应该肯定，在疆域史和边界问题研究方面我们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然而，象我们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有那么多的邻国，有那么长的边界线，不仅有陆疆，还有海疆，亟待研究的问题很多，仅组织少数人在内部从事研究，显然是很不够的。由于边界问题关系到国家领土主权，一向被学术界视为禁区，很少有人问津，是一门被冷落已久的学科，所以，直到今天，我们出版的有关学术著作，仍然寥寥无几，屈指可数。这同我们的一些邻国一贯重视边界问题研究相比，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例如苏联，他们在这方面投进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他们的研究机构比我们多，研究人员比我们多，出版有关的论著也比我们多得多。他们的著作不仅用俄文出版，同时还用英文出版，不遗余力地在国际上传播他们的观点。而我们的一些刊物和出版社，已多年不愿接受有关中苏边界问题的论著了。又如中印边界问题，从一九五八年起，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印度和其他国家先后出版的有关著作数以百计，在同一期间，我们只发表了少量的文章和出版几本小册子。至于越南和南朝鲜，他们也在边界问题研究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并提出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从学术上说，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的固然有，但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蓄意歪曲边界问题历史真相的也很不少。以上情况说明，组织人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加强清代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研究，已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我国边界问题研究其所处于比较冷落的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我们的某些规定和做法，不是有利于促进这门学科的发展，而是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边界问题的研究限制过严，甚至于把它视为禁区，档案资料的借阅，研究成果的发表和出版，关卡重重，困难甚多，严重地挫伤了研究人员的积极性。此外，研究边界问题，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历史地理、边疆考古、语言文字等领域，范围广泛，难度较大，出成果慢，影响晋职晋薪，而且还可能要承担难以估计的政治责任，这也是边界问题研究鲜人问津，呈现冷落局面的原因。

要有成效地开展清代疆域和边界问题的研究，我认为应该实行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做法，改革一些不适应这门学科发展的规章制度。首先应该放宽研究人员查阅边界档案资料的限制，简化借阅和利用档案的手续，因为没有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是根本谈不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其次要放宽对边界问题研究成果发表的限制，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有关疆域和边界问题方面的论著，只要有理有据，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不损害国家民族利益，就要让它有发表的机会。真理愈辩愈明，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利于学术的发展。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只能使这门学科停滞不前。第三，对于国外一些歪曲中国疆域史和边界变迁史的观点，要允许中国学者作出反应。学者的意见，不代表政府的观点，不负外交政治责任。要破除以往给人的这种印象，似乎我们发表的一切有关边界问题的文章，都是代表政府的。第四，目前我国研究疆域和边界问题的人员甚少，而且日趋老化，后续乏人，应采取措施调动全国各地、特别是边疆地区老专家的积极性，加紧研究生和在职研究人员的培养，建立一支有较高研究水平的队伍。第五，要有计划地编辑出版有关疆域和边界的资料和著作，包括翻译出版国外有关论著和资料。实行全国大协作，争取每年出版若干种。要创办一个边疆史地研究的刊物，让研究人员有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的园地，以利于学术交流和研究成果的积累。

我相信，经过全国同行们的共同努力，疆域史和边界史研究定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